

被塑造的形象：侯外庐中国社会史研究新论

任 虎

【摘 要】近80年来,学界将侯外庐的生产方式理论塑造成“反对斯大林理论”形象,却忽略其理论形成的苏联背景。侯外庐在翻译马克思《资本论》的过程中,结合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编著的《生产力与生产方法》初步奠定生产方式范畴,以兹依米耶斯基《辩证法的唯物论》作为批判、吸收对象,进而在拉苏莫夫斯基《社会经济形态》的刺激、激励下形成较完善的生产方式理论体系。当他在1940年关注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后,对其中的辩证唯物主义部分高度赞扬,而对历史唯物主义部分规定的社会发展阶段具体特征存在分歧。他以亚细亚生产方式反对《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支持下的西周封建论者,并集中就周代社会性质作对话式探讨。

【关键词】侯外庐;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生产方式;亚细亚生产方式

【作者简介】任虎,杭州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

【原文出处】《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福州),2022.9.166~176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2021ECNU-HLYT041),并获得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研创新计划重大项目资助。

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五老”之一,侯外庐的中国社会史研究“无论是古代的奴隶制社会和中古的封建制社会”都是从探究生产方式开始的。^①以往学界探究侯外庐社会史研究的理论背景,多突出马克思《资本论》与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影响,却忽略其他知识背景,将他塑造成“反对斯大林理论”的形象。^②学界普遍认为,1939年侯外庐在《社会史论导言》(以下简称《导言》)中提出生产方式是“生产手段与劳动力之特殊的结合关系”,^③是为反对斯大林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以下简称《主义》)中,定义生产方式为“把社会底生产力和人们底生产关系两者都包含在内,而体现着两者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的统一”。^④因为侯外庐将生产方式作为社会史研究的“方法论指导”,^⑤所以近80年来,“反对斯大林理论”这一被塑造的形象持续影响着学界对其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基本认识。

实际上,这一形象存在时间颠倒和“张冠李戴”的状况,且不符合侯外庐的学术品格及时代情境。首先,侯外庐最初在1933年《社会史导论》(以下简称《导论》)中讨论生产方式,而斯大林在1938年9月发表《主义》,二者顺序被颠倒,且侯外庐已在《导言》表明批评对象并非斯大林(见下文)。其次,侯外庐在学术领域具有直言不讳的性格,无论对罗隆基、严灵峰等人,还是对作为社会史研究“引路人”的郭沫若,他都持客观评价态度。与此相对,他从未认同其生产方式定义被批为与斯大林“相悖”,而认为批评者出于“对国际共产主义领袖人物的尊重”。^⑥斯大林受到中共普遍拥戴,侯外庐就在《导言》发表3个月于《中苏文化》主编“斯大林六十寿辰庆祝专号”,刊登《斯大林——世界学术传统的继承者》《斯大林和辩证法唯物论》《斯大林时代的苏联科学》等文,歌颂斯大林是“世界学术传统的继承者”。^⑦

以上均说明侯外庐被塑造的形象与实际出入较大,转而提示彼时他服膺苏联学界尤其是斯大林理论。侯外庐多次强调他将社会史尤其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研究列在“研究课程表之中”缘起于“苏联学者论战”,^⑧“历史发展率”研究也是做苏联学界“理论延长的工作”。^⑨因此,本文将从侯外庐这一被塑造的形象出发,通过情境还原和文本分析,重新梳理侯外庐中国社会史研究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一、侯外庐中国社会史研究理论的形成

据侯外庐自述,他从事中国社会史研究是从“1931年算起”。该年,他在哈尔滨政法大学经济学系任教,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次年,他迁往北平,参加“左翼教师联合会”,并在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讲授“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时值社会史论战,各派学者对生产方式、亚细亚生产方式有不同看法,这引起侯外庐“对古史的兴趣”,开始搜集、翻译《资本论》等经济思想论著,作为“研究历史的必要的思想理论准备”。^⑩

因1932年底“许侯马事件”,次年侯外庐前往山西,开始古史研究。他根据“研读和翻译《资本论》的体会,力图从经济学和历史学统一应用的角度,讨论生产方式”,历时2个月写成《导论》,^⑪但该文寄往《中山文化教育季刊》未被采用。1938年,他从重庆北碚文化教育馆找回投稿,“在原稿的基础上进行修订,把一些过时的属于批判性的文字删去”,次年以导言形式发表在《中苏文化》。^⑫这虽不是1933年初版,但透过该文可以分析他在1931—1939年间的生产方式理论来源和变化。

在该文中,侯外庐反对学界既往的技术决定论、商品流通或商业资本决定论、剥削关系决定论等观点,强调生产方式(即下文“生产方法”)对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他强调生产方式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定义和关系问题,两处反对既有研究观点:

有人把生产方法,视为生产诸力的总和,这是极其错误的。我们在《资本论》中常看到生产力与生产方法之对立(引文见后),看不到二者之混同,因而认生产力为决定社会——经济的构成之契机,那显明

地忘却社会发展运动之内容和形式辩证法的矛盾。(第二节)

生产诸关系与生产诸力,都是复数,而惟生产方法是单数,所以生产诸力的总和是当做社会发展的全内容,而生产诸关系的总和当做社会发展的全形式,理解着。二者,是生产过程中内容和形式的对立面,把一定的生产诸力与生产诸关系,用一种指导这对立的生产过程之倾向的特独方式,即决定并支配它们全运动全性质的东西,而介绍着,贯联着,便是生产方法。然,这里,并不是如兹依米耶斯基的见解,认为生产方法是生产诸关系与生产诸力之对立的统一。它至多不过是,运动中的生产过程之表示对立面发展的一种导式或倾向。因为生产方法一方面再发展生产物,而且不断地再生产着生产诸关系。(第五节)^⑬

可以看出,侯外庐在第一处是针对技术决定论者推崇的“生产力决定社会性质”,批判对象包括布哈林、严灵峰、郭沫若等人;第二处则是学界误解的根源,但批评对象明显不是斯大林,而是“兹依米耶斯基”这一极少被人关注的学者。兹氏有“兹依米耶斯基”“兹依米扬斯基”“资米扬斯基”“推米扬斯基”“冀米扬斯基”“茨米扬斯基”等中译名。那么侯外庐是从何处获取兹氏的生产方式论述的呢?

“兹依米耶斯基”译名出自侯外庐的故友温健公(1908—1938)。侯外庐在山西期间,与温健公、邢西萍等组织中外语文协会,1935年创办《中外论坛》并担任编委。这时期,温健公翻译兹氏《辩证法的唯物论》第2版为《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发表在《中外论坛》。他赞颂兹氏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是“苏联社会科学界所通用”,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辩证法的研究去展开社会科学的方法论”。^⑭

兹文与侯文的批评文字存在极大关联。兹氏在《生产方法》一节提出“生产方法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并从《资本论》“生产方法的规定性”出发,认为“这个规定性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矛盾形式的规定性”,即“在生产方法成为敌对的社会之一定的生产方法以后”,也存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

矛盾的一种生产方法”。^⑮由此判断,侯文批评的“生产方法是生产诸关系与生产诸力之对立的统一”来源于此,只是整合兹文的“统一”与“矛盾”论述,并用“对立”代替“矛盾”。

这充分证明,侯外庐在《导言》增加“然,这里,并不是如兹依米耶斯基……”这句缺乏关联且突兀的文字,是在1933年初稿基础上增加对兹文的批判、吸收,后一句“它至多……导式或倾向”实际也属增添(见下文),而这两句之前的文字较大程度保留初稿。换言之,溯源初稿能最大程度还原他的生产方式最初理论来源。而1932年他在北平密切关注社会史论战,并在北平师范大学“唯物史观”课讲授“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在中国大学作“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讲演”。^⑯这提示侯外庐获取生产方式理论的时间和地点。经过情境还原和文本比对,发现北平导群书店出版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对侯外庐有直接影响。

在北方左翼文化运动兴起之际,诞生了众多进步团体和出版机构,它们积极译介苏联马列主义和经济论著,北平导群书店是其中典范。1932年,导群书店不仅出版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苏联经济史的发展其现况及其前途》等著作,还发行了吕振羽《中日问题批判》。^⑰其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1931年由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发行,次年6月由日本“普洛科学苏联研究社”译为日文在东京白扬社出版,李含章、雷用中据日文转译,10月译毕后在导群书店出版。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通过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论述,来统一苏联学界论战,正如出版广告宣称:

在辩证法唯物论的研究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最主要最严重的一个问题。正因如此,所以从来对于它的纠纷最多,争辩最烈,而且最不容易得着共同的答案。……可以说在现在讨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文献中,它是最完备最有权威而且是唯一的著作了。……书中附有研究问题、研究资料,以及研究的方法等,凡我研究辩证唯物论的时代青年,均宜手

执一编。^⑱

通过文本比对,侯外庐比较认可该书“最完备最有权威而且是唯一”的地位和政治立场,参考程度颇高。如该书谈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时指出:

物质的生产诸力,是社会生产过程的内容;生产诸关系是社会的形态;这二者是辩证法地统一的。随着物质生产诸力发展的阶段,生产诸关系的性质也就被决定。物质生产诸力与生产诸关系之辩证法的统一,即社会生产过程之内容与其形态之辩证法的统一。德波林派(哥尼可曼、冀米扬斯基,及其他)对于生产诸力与生产诸关系之辩证法的统一,是用一种观念论的方法去处理的。^⑲

比较而言,侯文进一步发展该书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论述。第一,在定义方面,他保留“内容”和“形态”的提法,认为“生产诸力的总和是当做社会发展的全内容……生产诸关系的总和当做社会发展的全形式”;第二,他反对定义二者关系为“内容与其形态之辩证法的统一”,而认为是“内容和形式的对立面”;^⑳第三,两文均反对德波林派。

1930年代以后,兹依米耶斯基常作为德波林派主要代表而受到批评。永田广志认为“推米扬斯基”等德波林主义者是“理论与实践的分离,哲学与现实的游离”,“忽视像史的唯物论这样和社会现实密切结合的领域”。^㉑米丁、易希金柯强调“资米扬斯基”等德波林派是孟塞维克观念论、修正派。^㉒侯外庐批判兹氏植根于苏联学界的评价基础。1932年,他在北平大学“介绍过苏联对布哈林、德波林的批判”,在中国大学公开批判托派理论。^㉓1935年,他公开表露“正统派的社会主义学者”立场。^㉔1939年,他直言“在波格达纳夫与布哈林以及德波林译品满布中国时代”,造成社会史研究的“杂乱现象”。^㉕

当侯外庐在1938年找出5年前的初稿时,适逢沈志远翻译的拉苏莫夫斯基《社会经济形态》出版。该书被列入“大苏维埃百科全书”,篇幅较短,第一部分分述社会经济形态的地位、生产方式等方面,第二部分梳理从原始共产主义到共产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发展过程。^㉖侯外庐阅读后,于次年3月发表书

评。他称颂该书是研究或编著社会发展史“最好的‘导言’参考”，提供了“社会史论的基础修养”和“概括简短的正确说明”，是目前“更正确的理论介绍著作”。但由于内容“简短”，尚未系统论述生产方式理论，侯外庐便指出：

在每一个部分皆有独立扩充研究的价值，我们应该本此方针去介绍并阐明的。关于本书第二部分的研究，作者曾搜集了《资本论》等书中二百余条“生产方法”(produktionsweise)的言论，正在写一篇生产方法(生产导式)论，将与读者商榷。^②

结合前文，这提示侯外庐将在1933年《导论》基础上“独立扩充研究”生产方式。因此，他批评兹依米耶斯基后，又提出生产方式“它至多不过是，运动中的生产过程之表示对立物发展的一种导式或倾向”。“导式”正是他在书评中对沈志远将“Mode”译为“方法”的意见，而且6个月后他还在《导言》中强调应将“生产方法”“生产方式”“生产样式”改为“生产导式”或“生产指导法”。^③

综上所述，侯外庐的生产方式理论来源除《资本论》外，还重点参考苏联学界成果。正如他在1945年坦言：自己关于生产方式的结论与苏联学界“相同”，具体说明是“根据我翻译《资本论》的经验而补充材料的”。^④侯外庐对苏联学界的“理论延长工作”，是不断汲取苏联理论的过程。侯外庐最初在1933年写成讨论生产方式的《导论》，重点参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和《资本论》。其后，他又批判吸收兹依米耶斯基理论，并受拉苏莫夫斯基观点的激励。

《导言》引起学界误解，是因为正值中共开展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下简称《联共党史》)为中心的马列主义学习运动，《联共党史》第4章第2节的《主义》也被确立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权威。侯外庐关于生产方式的定义，适逢其会遇到《主义》，被认为与之“相悖”，逐渐被塑造成“反对斯大林理论”形象。那么侯外庐在《导言》发表前究竟有没有接触《主义》，又是如何看待《主义》呢？这需要从《主义》的传播履迹和侯外庐的研究历程来分析。

二、《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在重庆的传播

1938年9月，《主义》在苏联《真理报》发表。《主义》除作为《联共党史》一节外，还被收录在《列宁主义问题》第11版，《主义》单行本第一版发行达300万册。^⑤《主义》肃清了以往理论论争的分歧，从学理上统一了马列主义哲学体系，被盛誉为“马列主义哲学思想底顶峰”。^⑥

《主义》早期在国内传播主要借助重庆中国出版社版《联共党史》。^⑦1938年9月，博古(秦邦宪)组织翻译《主义》，12月在重庆中国出版社发行，次年2月在上海再版。博古认为《主义》是“近年来苏联的历史科学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底重大收获”，是“最正确而又简单的叙述，实为研究新哲学的不可多得的佳作”。^⑧

从时间和空间看，博古版《主义》初版、再版时间分别为1938年12月和1939年2月，身处重庆的侯外庐在1939年9月发表《导言》前看过《主义》的可能性较大，但实际并非如此。以重庆地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论著来看，该年8月，向林冰在侯外庐主编的《中苏文化》发表《苏联哲学在中国》，虽关注苏联学界“研究史大林的著作”，但未提及《主义》。^⑨12月8日，向林冰完成关于艾思奇《(哲学)研究提纲》的书评，也未提及《主义》。^⑩12月24日，他写成《再论辩证法法则的实际运用问题》，试图引用斯大林“正确的辩证法理论反驳艾思奇《大众哲学》、布哈林《史的唯物论的理论》等“毫无内容的空洞的概念游戏”，也仅引用《论民族问题方面的各种倾向》，而非内容更适合的《主义》。^⑪

直到次年1月19日，沈志远在《理论与现实》发表《唯物辩证法家的斯大林》，才系统介绍《主义》的内容和价值。^⑫10月15日，吴玉章在《理论与现实》发表《研究中国历史的方法》，大量引用《主义》的定义和结论文字。^⑬同日，向林冰完成《苏联三个五年计划中的理论斗争》，后在《中苏文化》发表，也关注《主义》，认为它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中斯大林阶段”。^⑭以上说明，直至1939年底，《主义》在重庆

的传播较有限,这与发行量较少且传播受限有关。因为《主义》初版于国民党政治中心重庆,当时《联共党史》就被列为禁书,^⑩故次年《主义》转至上海再版。

值得注意的是,侯外庐同时担任《中苏文化》主编以及《理论与现实》编委,向林冰、沈志远、吴玉章等人研究《主义》的时间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侯外庐的关注时间。这进一步证明侯外庐在发表《导言》前关注《主义》的可能性较低,否则难以解释《导言》为何没有涉及主题密切相关的《主义》。

侯外庐接触并应用《主义》缘起于中共马列主义学习运动。1940年1月3日,中共发布《中央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将“联共党史”与“历史唯物论与辩证唯物论”列为中、高级干部必修,^⑪并在延安“组织专人讲解”《主义》。^⑫中共还要求各地组织成立《联共党史》研究会和读书小组。^⑬据侯外庐回忆,1941年周恩来在重庆领导发起读书会,将《联共党史》列为研讨书籍,1943年前后他的生产方式观点也因此被部分同志批判与斯大林“相悖”。

就公开发表而言,侯外庐首次应用《主义》的文章完成于1940年10月31日,与向林冰几乎一致。他发表《历史阶段的了解》,以“根据斯大林所指示‘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完全适应于生产力的理论’,回应范同敏对剥削关系和生产方式的批评。^⑭该年他还关注到苏联学界讨论苏联经济结构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否适应,便“请友人把所有论战文献集合起来总括地在《中苏文化》八卷一期介绍出来”,^⑮即焦敏之在1941年1月编译发表的《苏联最近关于新社会发展法则之论争》,^⑯侯外庐为此专门作了后记。^⑰

此后,侯外庐收到苏联《马克思主义旗下》的“结论式”文章,再由焦敏之译出。他表示该文与自己“在意见原则上是相同的”,强调“尤其在开首一段,连引用文也和我的注意相同”,自己曾想以此为根据“计划写一篇更系统的长文”。^⑱实际上,该文的“引用文”依据正是斯大林在《主义》中关于苏联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完全适应的论述,引自《列宁主义问题》第11版。^⑲

综上可知,侯外庐最迟在1940年10月已密切关

注《主义》,并表达出极大理论认可。随着年底“皖南事变”爆发,他受周恩来指示专心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史,历经半年余完成《中国古典社会史论》,^⑳在讨论西周社会性质时也显现出对《主义》的回应。

三、侯外庐对《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回应

侯外庐对《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部分,分别表现出认可和商榷的态度。在辩证唯物主义方面,侯外庐的认可程度颇高,这主要反映在他与罗克汀合著的《新哲学教程》。据罗克汀回忆,1945年他在侯外庐的指导下“合著了《新哲学教程》”;^㉑侯外庐与他“讨论了写作大纲之后”,花费一年时间合作撰写,于次年出版。^㉒

《新哲学教程》尤为推崇《主义》。侯外庐在《自序》中号召青年学者读“具体”真理的“范例的著作”,^㉓并在书中强调《主义》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一、具体地将辩证法分成四个要点；二、指出理论和政治的实际联系；三、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特殊法则，特别是关于生产关系完全适应于生产力的学说，是发展了内容与形式的哲学范畴的。”⁽⁵⁴⁾因此，书中大量引用和参考《主义》，如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区别，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定义、关系和特征等。

在历史唯物主义方面,需将视角聚焦在侯外庐从事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主要课题——亚细亚生产方式,着眼于中国历史分期。他在分期问题上基本与郭沫若站在统一战线,反对西周封建论、魏晋封建论等。而中共史学界内部主流思想偏向西周封建论,主要代表人物有吴玉章、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等,自1940年毛泽东署名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发表后,这种趋势进一步加强。随着《主义》传入,西周封建论者不约而同地将《主义》作为依据。《主义》规定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认为“历史上有五种基本生产关系”,并总结每个历史阶段的具体特征。换言之,只有当某个社会阶段的主要特征符合《主义》规定的生产工具、生产关系、生产工作者、商品交换、剥削关系等条件,才能被认定为属于某种社

会阶段。^⑤

《主义》传人后,斯大林“关于社会发展和社会形态的看法,成为公认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经典表达”。^⑥1940年3月,吕振羽以《主义》“卓越的天才的结论”为依据,通过对比《吴越春秋》《孟子》等文献,认为自西周起虽保留奴隶制残余,但“表现中国封建社会特殊形相的一面”。^⑦同年5月,范文澜依据《主义》“明确的指示”,认定殷代是奴隶社会,西周虽有“氏族社会、奴隶社会的残余保留”,但已开始进入封建社会。^⑧范文澜还将《主义》作为《中国通史简编》的主要理论借鉴对象。^⑨当1941年初侯外庐研究中国古代史时,首先需要面对以《主义》为依据的西周封建论者。因此,侯外庐在郭沫若从文字方面“考证了奴隶制”的基础上,计划“在理论上进一步论证了奴隶社会”。^⑩

侯外庐以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作为回应。他在承认斯大林强调的“五阶段论”基础上,更强调每个民族有不同的发展路径。他通过分析马克思在不同文本中关于“亚细亚”“古典”的排列顺序,在1941年初步提出中国古典社会的“亚细亚性”,^⑪在1943年确立“亚细亚生产方法”,^⑫在1946年进一步提出亚细亚“路径说”。他认为:

我断定“古代”是有不同路径的,在文献上言,即所谓“古典的古代”、“亚细亚的古代”,都指奴隶社会。……“古典的古代”是革命的路径,而“亚细亚的古代”则是改良的路径。^⑬

侯外庐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在承认奴隶制前提下将中国古代与西方古典的奴隶制相区别。从他在1942年发表的《周代社会底诸制度考》和1943年出版的《中国古典社会史论》中,能清晰看出他与西周封建论者的“隔空对话”。

在《周代社会底诸制度考》中,侯外庐在开篇就强调已看过“范文澜先生的《中国历史简编》”等书,但“不同意于各家的论断”,深感对周代社会制度“应有一番商讨”。他通过比较希腊、罗马古典的奴隶制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共同性与特殊性,来分析周代社会性质。一方面,他分析周代和希腊、罗马共有的

联盟性质、奴隶制存在自由民“国人”等特征,指出二者皆是奴隶制阶段。另一方面,他从“城市与农村的对立”角度分析“中国特殊的城市国家底性质”,得出周代国与野的“不可分裂的统一”,也就是“亚细亚的特殊之点”。^⑭

值得注意的是,该文发表前存在删节或省略情况。因“篇幅所限”,侯外庐“未能作批评的商讨”,只“发挥个人的研究”,^⑮但仍能看出他回应《主义》及西周封建论者。如:斯大林强调奴隶制“生产工作者便是奴隶主所能当作牲畜来买卖屠杀的奴隶”,^⑯侯外庐便突出“奴隶和牛马的区别”;吕振羽、范文澜认为“夫”“白丁”“庶民”等是封建农奴,侯外庐则指出“邑”“室”“宗室”等反映奴隶和奴隶主;范文澜提出“周的农民是私有经济的个人所有制”,侯外庐则认为周代“国人”与希腊、罗马同属奴隶社会,并以“俘民夺野侵鄙”战争证明。^⑰

1943年,侯外庐从苏联学者费德林处获得马克思遗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开始将马克思认为亚细亚历史是特殊的“城市与乡村之不可分裂的统一”的理论应用于历史分期。^⑱他强调将城市与农村的分离关系、生产方式作为判断标准,^⑲并详细考察殷、周两代“生产要素的具体内容和发展过程”。^⑳在此基础上,他在《中国古典社会史论》中,通过分析西周“封国殖民”的发展、周代城市国家的“亚细亚特性”、城市与农村的关系、殷周生产方法特征等因素,论证奴隶制性质。

此外,他针对范文澜根据《主义》将铁器作为封建制主要特征之一,而“关于西周铁的记载很少”的情况,^㉑特别指出:“在西周主要的农业生产上,不但周金中没铁的记载,而且在可靠的文献中亦没有直接证据。西周之为青铜器时代,这是不会有问题的。”^㉒同时,他强调考察土地因素,指出“劳动力以外的条件,便是土地生产手段”,因为周代的土地是“国有”而非私有,“支配的生产方法便是氏族贵族的土地国有生产手段和氏族奴隶的集团劳动力二者之结合关系”。^㉓他认为“这一关系支配的东方古代的社会构成,它和‘古典的古代’是一个历史阶段的两种

不同的路径”,^④因此是奴隶社会。

综上所述,当面对风靡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界的《主义》时,侯外庐充分认可其辩证唯物主义部分,但在历史唯物主义部分出现分歧。他坚持“五阶段论”,但在历史分期方面并不认同以《主义》为依据的西周封建论。

结语

侯外庐的生产方式研究、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肇始于1930年代初期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理论渊源自彼时尚未统一理论体系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因此,他直接参考1931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编著的《生产力与生产方法》,结合翻译《资本论》过程的体会,针对社会史论战中出现的问题,初步完成“处女作”《导论》。^⑤侯外庐坚持理论探索,1933—1939年间不断吸收苏联学界成果,先后以兹依米耶斯基、拉苏莫夫斯基作为批判吸收对象,在《导言》中形成较完善的、系统的生产方式理论。他坚持生产方式对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并以其指导中国社会史研究,从而产生丰硕成果。

侯外庐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反对教条主义。他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虽然站在斯大林强调的“五阶段论”立场,但更强调中国“亚细亚”与希腊、罗马“古典”的不同之处,是特殊发展“路径”。他认识到过度拔高《主义》不利于学术争鸣,始终坚持同西周封建论者展开论争。1949年,当被学生指出生产方式“不符合斯大林的提法,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时,他预感到强调寻章摘句、以政治代学术的“扣政治帽子”的危害。^⑥因此,他在1950年代中期强调不能全盘接受苏联学界的观点,^⑦提出要反对教条主义,尤其是“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对中国的影响就很大”。^⑧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日益繁荣,不仅要克服寻章摘句、以政治代学术和教条主义的评价标准,也要克服对过去“一概推翻”以及“以被批判为真相”的学术批评态度。正如吴泽、桂遵义强调,要“革除长期以来习惯于寻章摘句、搞‘本本主义’的不正之风”,要“尊重历史,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判断历史

是非的唯一标准”。^⑨

注释:

①侯外庐:《我是怎样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历史教学问题》1982年第4期。

②参见刘大年:《侯外庐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历史研究》1988年第1期;张岂之、刘文瑞:《试论侯外庐关于社会史分期的法典化标准》,《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2期;彭卫:《侯外庐对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探索及其史学观念》,李振宏主编:《朱绍侯九十华诞纪念文集》,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页;刘文瑞:《略论侯外庐在史学理论方面的两个贡献》,《中国史研究动态》2016年第6期;程鹏宇:《论侯外庐对马克思生产方式理论的研究与运用》,《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6年第2期;周鑫:《20世纪三四十年代侯外庐中国思想史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42—143页;等等。

③侯外庐:《社会史论导言》,《中苏文化》1939年第4卷第2期。按,侯外庐对生产方式的定义存在变化过程,他以《资本论》为参照,1940年代初期将生产方式概括为“特殊的生产手段与特殊的劳动力之结合关系”,1950年代中期将生产方式总结为“特殊的生产资料和特殊的劳动力的结合关系”,1980年代中期将生产方式归纳为“特殊的(历史上一定的)生产资料和特殊的(历史上一定的)劳动者(力)二者的特殊结合方式”。参见侯外庐:《中国古典社会史论·序言》,五十年代出版社1943年版,第3页;《论中国封建制的形成及其法典化》,《历史研究》1956年第8期;《韧的追求》,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12页。

④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列宁主义问题》,唯真译校,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49年版,第723页。

⑤侯外庐:《韧的追求》,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13页。

⑥侯外庐:《韧的追求》,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13页。

⑦参见《中苏文化》1939年12月21日“斯大林六十寿辰庆祝专号”。

⑧侯外庐:《我对于“亚细亚生产方法”之答案与世界历史学家商榷》,《中华论坛》1945年第1卷第7、8期合刊。

⑨侯外庐:《苏联历史学界诸论争解答》,“自序”,建国书店1945年版,第1页。

⑩侯外庐:《韧的追求》,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9、33—35、209—210页。

⑪侯外庐:《我对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历史研究》1984年第3期。

- ⑫侯外庐:《韧的追求》,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11页。
- ⑬侯外庐:《社会史论导言》,《中苏文化》1939年第4卷第2期。
- ⑭兹依米扬斯基:《社会科学的方法论——译自〈辩证法的唯物论〉(第二版)》,温健公译,《中外论坛》1935年第1卷第3期。
- ⑮兹依米扬斯基:《社会科学的方法论——译自〈辩证法的唯物论〉(第二版)》,温健公译,《中外论坛》1935年第1卷第4期。
- ⑯侯外庐:《韧的追求》,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4—35页。
- ⑰据刘茂林、叶桂生考察,吕振羽的《中日问题批判》系由中共地下党员张凤阁推荐至导群书店出版。参见刘茂林、叶桂生:《吕振羽的治史道路》,《文献》1980年第2期。
- ⑱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编:《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李含章、雷用中译,导群书店1932年版,书后广告。
- ⑲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编:《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李含章、雷用中译,导群书店1932年版,第3页。
- ⑳1940年12月,侯外庐再次应用“内容”与“形式”提法,将过去苏联学界关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定义概括为“机械地运用卡尔主义”:“诚然,在过去苏联学者亦曾把苏联社会主义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认为是特别的内容与形式的对立,然而这种机械地运用卡尔主义而忽视新社会的发展法则之理论,已严重地遭受批评。”参见侯外庐:《历史阶段的了解》,《读书月报》1940年第2卷第9期。
- ㉑永田广志:《唯物史观讲话》,阮均石译,新知书店1938年版,第152页。
- ㉒米定、易希金柯编著:《辩证法唯物论辞典》,平生、执之、乃刚等译,新中国书局1949年版,第118页。
- ㉓侯外庐:《韧的追求》,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4—35页。
- ㉔巨金:《侯外庐印象记》,李孝迁、任虎编校:《近代中国史家学记》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289页。
- ㉕(侯)外庐:《读物批评介绍:〈社会经济形态〉》,《读书月报》1939年第1卷第2期。
- ㉖参见拉苏莫夫斯基:《社会经济形态》,沈志远译,新中国书局1949年版。
- ㉗(侯)外庐:《读物批评介绍:〈社会经济形态〉》,《读书月报》1939年第1卷第2期。
- ㉘侯外庐:《社会史论导言》,《中苏文化》1939年第4卷第2期。
- ㉙侯外庐:《苏联历史学界诸论争解答》,“自序”,建国书店1945年版,第1页。
- ㉚汉夫:《书报介绍:〈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杂志半月刊》1939年第4卷第4号。
- ㉛苏联马恩列学院编:《斯大林传略》,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46年版,第94页。
- ㉜任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1919—1980)》,《人文杂志》2021年第6期。
- ㉝博古:《前言》,斯大林:《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博古译,中国出版社1939年版,第1页。
- ㉞向林冰:《苏联哲学在中国》,《中苏文化》1939年第4卷第1期。
- ㉟向林冰:《关于艾拟〈(哲学)研究提要〉的高稚》,《理论与现实》1940年第1卷第4期。
- ㊱向林冰:《再论辩证法法则的实际运用问题》,《读书月报》1940年第1卷第12期。
- ㊲沈志远:《唯物辩证法家的斯大林》,《理论与现实》1940年第1卷第4期。
- ㊳吴玉章:《研究中国历史的方法》,《理论与现实》1940年第2卷第2期。
- ㊴向林冰:《苏联三个五年计划中的理论斗争》,《中苏文化》1940年“苏联十月革命23周年纪念特刊”。
- ㊵如范文澜就因被查出随身携带《联共党史》而被捕。参见范元维:《我的父亲范文澜在河南的一段经历》,《范文澜全集》第10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15—516页。
- ㊶《中央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38—1943)》,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168页。
- ㊷万树玉编著:《茅盾年谱》,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66页。
- ㊸杨松:《关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底宣传》,《解放》1941年第128期。
- ㊹侯外庐:《历史阶段的了解》,《读书月报》1940年第2卷第9期。
- ㊺侯外庐:《苏联历史学界诸论争解答》,建国书店1945年版,第164页。
- ㊻焦敏之编译:《苏联最近关于新社会发展法则之论争》,《中苏文化》1941年第8卷第1期。
- ㊼侯外庐:《写在〈苏联最近关于新社会发展法则之论争〉之后》,《中苏文化》1941年第8卷第1期。
- ㊽侯外庐:《苏联历史学界诸论争解答》,建国书店1945年版,第164页。

④《马克思主义旗下》编辑部：《关于社会主义下生产关系与生产力适应的论争——对编辑部收到各篇文章的评论》，赵华(焦敏之)译，《中苏文化》1941年第8卷第5期。

⑤侯外庐：《初的追求》，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09页。

⑥罗克汀：《罗克汀自传》，《晋阳学刊》编辑部编：《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3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68页。

⑦侯外庐：《自序》，侯外庐、罗克汀：《新哲学教程》，上海新知书店1946年版，第1页。

⑧侯外庐：《自序》，侯外庐、罗克汀：《新哲学教程》，上海新知书店1946年版，第2页。

⑨侯外庐、罗克汀：《新哲学教程》，上海新知书店1946年版，第66页。

⑩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列宁主义问题》，唯真译校，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49年版，第727—728页。

⑪彭卫：《侯外庐对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探索及其史学观念》，李振宏主编：《朱绍侯九十华诞纪念文集》，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页。

⑫吕振羽：《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诸问题》，《理论与现实》1940年第2卷第1期。

⑬范文澜：《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中国文化》1940年第1卷第3期。

⑭任虎：《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对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的影响》，《史学理论研究》2021年第3期。

⑮侯外庐：《初的追求》，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24—225页。

⑯侯外庐：《中国古典社会史论》，五十年代出版社1943年版，第61页。

⑰侯外庐：《我对于“亚细亚生产方法”之答案与世界历史家商榷》，《中华论坛》1945年第1卷第7、8期合刊。

⑱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自序”，新知书店1948年版，第2页。

⑲徐乐英(侯外庐)：《周代社会底诸制度考》，《群众》1942年第7卷第14期。按，侯外庐在晚年总结道：“我认为周代封国所以不能认为是封建社会，主要在于它没有‘以农村为出发点’的经济基础。就是在率领集团的氏族奴隶开疆启宇，建筑驾馭于农村的城市方面，它的经济技术条件也是非常之低劣的。”参见侯外庐：《初的追求》，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26页。

⑳徐乐英(侯外庐)：《周代社会底诸制度考》，《群众》1942

年第7卷第14期。

㉑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列宁主义问题》，唯真译校，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49年版，第727页。

㉒参见吕振羽：《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诸问题》，《理论与现实》1940年第2卷第1期；范文澜：《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中国文化》1940年第1卷第3期；徐乐英(侯外庐)：《周代社会底诸制度考》，《群众》1942年第7卷第14期。

㉓侯外庐：《中国古典社会史论》，五十年代出版社1943年版，第37页。

㉔侯外庐：《中国古典社会史论》，“自序”，五十年代出版社1943年版，第3页。

㉕侯外庐：《初的追求》，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17页。

㉖范文澜：《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中国文化》1940年第1卷第3期。

㉗侯外庐：《中国古典社会史论》，五十年代出版社1943年版，第85页。

㉘侯外庐：《中国古典社会史论》，五十年代出版社1943年版，第17、52页。1945年，郭沫若也采用与侯外庐基本相同的观点佐证西周奴隶制，提出“重要生产工具，以农业而言便是土地”。1951年，范文澜对此回应：“主张西周是奴隶社会的历史学者，其基本论据建立在‘重要生产工具，以农业而言便是土地’这个原则上，依据《联共党史》所昭示，土地与生产工具同列于生产资料之内，土地不能当作生产工具。”参见郭沫若：《十批判书》，群益出版社1947年版，第12页；范文澜：《关于〈中国通史简编〉》，《科学通报》1951年第2卷第6期。

㉙侯外庐：《我对于“亚细亚生产方法”之答案与世界历史家商榷》，《中华论坛》1945年第1卷第7、8期合刊。

㉚侯外庐：《侯外庐自传》，《晋阳学刊》1982年第5期。

㉛侯外庐：《初的追求》，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13—214页。

㉜如1956年1月1日侯外庐致信孙长江：“苏联学者的论断常为我们的学者全盘接受，如老子、如周子等。这是非常不好的懒惰作风。”参见侯外庐：《侯外庐论学书札》，《中国哲学》1982年第8辑。

㉝《克服理论宣传工作中教条主义习气问题座谈会记录摘要》，《学习》1956年第7期。

㉞吴泽、桂遵义：《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开展历史研究》，《中学历史教学》1979年第1期。